

从跨文化比较角度谈东干学研究的价值

丁 宏

内容提要 中亚东干人是回族移民的后裔,现有1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作为一个讲汉语西北方言、从体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异于周围其他民族且因擅长经商而成为中亚经济发展中活跃因素的东干人,历来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因而形成以研究东干文化为内容的独立学科——东干学。本文主要从跨文化比较角度探索东干学研究对于了解回族文化在异域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考证等方面的价值,进而就如何发挥东干人在中亚地区优势以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问题做简要阐述。

关键词 东干人 东干学 文化比较 回族

19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北地区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回民起义。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军将士及其眷属为躲避清军追杀,西越天山,定居在当时的俄国境内。他们自称“回族”、“老回回”、“回民”、“中原人”,俄罗斯人及中亚各族人称他们为“东干”、“通干”。在1924年中亚民族划界时,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将其民族名称定为“东干”,从此东干人正式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保留着自己的母语——汉语西北方言,也保持着本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十月革命后,东干人在社会地位及经济文化生活方面都获得飞速发展。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创制了本民族文字,出版发行东干文书报。东干人子弟可以在东干人聚居区的东干人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国家广播电台定期进行东干语广播。

东干人是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移民群体。她分散居住在中亚广袤的土地上,目前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从120年前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0万余人,始终以一个独立的、充满凝聚力且蓬勃发展的共同体形式而存在。应该说,这个民族的形成是一种偶然:120年前,当数千名中国回民起义军及其眷属翻越天山、定居中亚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一次被迫的避难事件,带来一个民族的诞生。从此,回族不再是中国境内独有的民族,她开始作为“跨界民族”存在于世并因此而在文化研究中有了其独特的价值。

不同类型的文化从相互隔离进入渗透和交融状态,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的迁徙,亦即移民。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产生新的文化,推动文化向前发展。正因为移民与人类文化相互关系的密切性,所以该课题在社会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作为一个华人移民群体的东干人,多年来没有被我国学者所重视。在探讨华人移民的著作中,很难见到关于他们的材料。

这里,我想在东干人聚居区实地调查及东干人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跨文化比较角度

对东干学研究价值做初步探讨。

一、东干学与东干学研究

作为原苏联东方学及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分支,“东干学”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而从俄文东干学研究的传统来讲,东干学最初是以中国回族研究为基础的。从19世纪初叶起,一些俄罗斯旅行家和汉学家就在自己的文章、通讯及研究中,介绍了中国回族的历史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知识。“正是通过俄罗斯文献,西方学者才了解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俄罗斯旅行家和学者们的功绩恰恰在于,他们不仅告诉人们有关东干人(回族)的最初成就,而且尽可能地尝试回答一系列有关东干学的问题”。

在19世纪60年代,关于中国回族的报道频繁出现于俄罗斯报刊中。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与回族为反抗清政府统治而发动的起义密切相关。这些起义以“东干起义”的名称载入俄罗斯文献,并成为当时俄罗斯汉学家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东干人(回族)起义课题时,也开始关注这个民族的起源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

随着部分回民由中国迁入中亚,有关东干人的文献的内容有所变化,涉及回族移民迁到中亚后的分布及其人口统计、文化、习俗等资料出现在俄国人所编纂的地理、年鉴及学术著作中。但从总体上来看,东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与原苏联政府有意识地培养边疆地区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分不开的。正是在东干人的干部培养及东干文字的创制过程中,包括东干知识分子在内的专业研究队伍,开始系统科学地对东干人的语言、历史、生活方式、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特别是1954年原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即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其语言文学研究所里,设立东干文化研究室。后来,东干文化研究室发展成为东干学部。东干学部是东干学专家最集中的地方,它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全面研究东干人历史文化,同时参加东干人学校东干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东干学部成立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极富价值的东干学研究成果,在学术界赢得很高的声誉,其中有·苏尚洛的《苏联东干文学纲要》(东干文,伏龙芝,1957年)、《七河地区的东干人》(伏龙芝,1959年)、《东干人(历史与民族学概况)》(伏龙芝,1971年)、《东干人的家庭与生活方式》(伏龙芝,1979年),·

·尤苏波夫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的合作化》(伏龙芝,1967年),·尤素罗夫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东干移民》(伏龙芝,1961年),·杨善新的《简明东干语—俄语词典》(伏龙芝,1968年),·伊玛佐夫的《东干语语音学》(伏龙芝,1975年)、《东干语句法纲要》(伏龙芝,1982年)、《东干语词法纲要》(伏龙芝,1987年)、《东干语语法》(比什凯克,1993年),·哈桑诺夫的《苏联回族民间曲子》(伏龙芝,1961年),·尤素罗夫、·哈桑诺夫的《东干民间神话传说》(伏龙芝,1977年),·尤素罗娃的《回族的顺口溜儿、口歌、格言和谜语》(东干文,伏龙芝,1984年),·马凯耶娃的《东干苏维埃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伏龙芝,1984年)等。以上成果展示了中亚东干人的历史、生活和创业过程,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大量成果是由东干本民族学者创造出来的。强调这一点并不多余,如果了解第一批东干人逃难中亚的

这与“东干”一词的沿用称谓有关。新疆和中亚说突厥语的民族把从陕西、甘肃迁移过去的回族叫做“东干”,俄文也沿用该称谓。

(吉尔吉斯)·苏尚洛:《东干人(历史与民族学概况)》,伏龙芝,1971年。

历史,了解他们 100 多年来在与文化母体隔绝的异域他乡营造新文化的历程,也一定能体会到他们创业的艰难和凝聚在其中的真正价值。

作为东干学研究的中心机构,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部还和国内外许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在学术上进行交流与合作,其中有俄罗斯科学院的民族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维吾尔学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土库曼大学、吉尔吉斯大学等。许多外国学者或机构,如日本的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葛维达(Svetlana Rimsky - Korsakoff Dyer)和芬兰的语言与交流研究所、德国的博胡姆大学等,都对东干语言与文字颇感兴趣。美国的中国学家在研究中国时,从民族问题研究的角度也涉及到东干学问题。各国学者在研究东干问题时,不仅注意到这个民族与汉族的密切联系,而且也对其独特的民族个性深感兴趣——这也正是东干学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

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部建立以后不久即与中国有关研究机构建立了友好联系,但由于历史原因,这种联系曾一度中断。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随着中、吉学者互访的实现,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部恢复了同中国学者在回族研究方面的交流活动。在我国的一些学术杂志上,如《西北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回族研究》、《甘肃民族研究》、《宁夏社会科学》、《东欧中亚研究》等,刊登了数十篇有关东干研究的论文、译文和访问记,吉尔吉斯学者·苏尚洛教授的民族学著作《东干人(历史与民族学概况)》也已翻译出版。目前,中吉两国学者的共同愿望是能够组织对中亚东干族和中国回族的文化比较研究,以求得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二、跨文化比较与东干学研究的价值

前面谈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东干学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在中国,这门学科刚刚起步,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在研究文化史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是讨论文化本身的发展,而忽略了创造文化的人、人的迁徙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东干人是一支从中国走出去的回族移民群体,随着社会分化时间的增长,处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环境及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成员由于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出现了诸种不同特征。比较这种“不同”在文化学研究中具有其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 从对比研究中,探索回族文化的特定内涵和真正价值

东干人和中国回族民族同宗同源,虽然从地域上来看,她是中国境外的一个独立民族,但从文化源流、民族特征、民族观念甚至从族群认同上讲,她是回族文化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应该把东干文化研究作为回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对回族学研究领域的丰富和扩展。这样的研究,能让我们在不同地区回族文化的比较中,进一步加深对回族文化的品格、特性和价值的认识与理解。

众所周知,建立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回族文化是在这两大高度发达的文化撞击、磨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本身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这一点已为中国回族在强

中译本名为《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大的汉族文化圈中仍以其独特的文化个性而存在的实际所证明。作为回族文化载体的东干人,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文化起点上。东干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中国回族不同,他们处在远离汉族文化的伊斯兰文化的氛围内,但东干人并没有因环境的关系或同是穆斯林的前提下逐步淡化汉族文化的因素向当地民族趋同,而是继续以回族先民初入中国时的方式,即学习、吸收一切能为自己所用的因素以求得生存,同时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个性。

由于中亚是一个穆斯林聚居区,所以说精神文化上的认同是东干人与周围穆斯林民族加强联系的感情纽带。在共同的宗教生活中,东干人对周围穆斯林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将其中一部分吸收到本民族文化中。此外,共同的语言为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提供了根本前提。东干人在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周围民族的语言:在比什别克(今比什凯克)、普尔热瓦尔斯克(今卡拉库尔)的东干人逐渐掌握了吉尔吉斯语,而生活在威尔内(今阿拉木图)、扎尔肯特(今潘菲洛夫)的东干人则学会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城市中的东干人最常用的是俄语。许多东干人掌握了几种语言,能熟练地使用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俄语。共同的语言为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消除了民族间的隔膜。

东干人在中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适应了当地多民族的社会环境,其民族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服装上,他们穿上了突厥民族的袷袂、吉尔吉斯式的连衣裙,扎起了各种颜色的花头巾;在生活方式上,东干人向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学会了畜牧业技术,他们也像周围游牧民族那样开始骑马,并习惯饮用牛奶、马奶等,运输工具也不再使用传统的两轮马车而用上“乌克兰式”四轮马车;他们的语言开始变化,他们不再以中国的“尺”、“寸”等做计量单位,而是开始使用“阿尔申”(俄尺)、“塔哈儿”(突厥语“口袋”)等借用语;他们的游戏里加进了游牧民族的赛马、叼羊……

就文化交流而言,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不仅仅产生单方面受益的现象,接触的结果往往是相互受惠、相互渗透。因此在历史上,一方面是中亚文化给东干文化带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是东干人也为当地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世代为农的东干人在经营农业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才干令周围民族人惊羨不已,他们种植水稻、蔬菜、水果等农作物,有些作物当地从来未曾见过。“在楚河、伊犁河谷,他们为当地推广新的作物——水稻。正是由于东干农民的努力,东干蒜、黄瓜、辣椒、萝卜、韭菜、嫁接的桃及各种葡萄在中亚推广开来”。东干人对农作物的加工技术也令周围民族人称道,他们独特的饮食,如凉粉、凉面、粉条、粉汤扁食(粉汤饺子)、蒸馍馍等也开始进入当地人的食谱。

东干文化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她的根在中国,其根本核心是回族文化。东干人在与中亚各族人民交往的过程中,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个性特点,以自己认定的轨迹发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东干人都坚持信仰伊斯兰教,以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和中国的传统美德来指导自己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成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准则。由于历史上东干人历经磨难,因此使他们具备了特别能吃苦耐劳的精神意志,具备倔强、固执的性格和坚毅、果敢的阳刚之气。他们倡导高度的自尊自信及自强不息精神,崇尚节俭,求是务实,看重亲情,提倡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第24届代表大会资料》,第91页。转引自·苏尚洛:《七河地区的东干人》。

忠孝。他们世代以土地为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谊深深灌注到东干人的民族意识与文化之中。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回族文化中有一些与汉族文化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如汉族文化中的“龙”,在继承了中国回族文化的东干文化中则以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出现。例如,在东干人办的武术学堂中,在学堂的正面墙上画上了腾飞的巨龙以作为发展向上的象征。甚至在早期东干清真寺建筑艺术中,如建成于20世纪初的普尔热瓦尔斯克清真寺,也在外墙上雕刻着神话传说中的龙的形象。这种现象说明,回族文化本身就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东干文化继承了其中的内容并且延续下来,这也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但重要的是,东干文化已经在回族文化的基础上,加进了更多汉族文化的内容,并被东干人视为区别于周围穆斯林民族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加以认同。如传统的东干民间口传文学中多是流行于中国民间的传说故事,比较著名的有“孟姜女的传说”、“三国故事”、“唐僧取经的传说”等等。汉族的一些传统习俗也为东干人所继承,如东干族老人常说:“天旱不下雨,要求雨呢”。东干人乡村中曾有过求雨现象,即全乡村的人摊钱买牛、羊,拿到有泉水的地方,请阿訇念“索儿”(《古兰经》中的某些章节),并以牛头、羊头“祭龙”求雨。可以说,在东干人对中国的认同意识中,已不仅仅限于与中国回族的认同,而是认同整个“中国”。这种打破中国国内民族界限的“认同”现象也存在于其他海外中国移民群体中。显而易见,东干文化中的汉族文化成分是他们区别于周围穆斯林民族的主要内容,如汉语、生计方式、建筑风格等都被他们在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巧妙地保留下来了。当然,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加强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伊斯兰教在任何时候都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但他们仍然通过“教坊”式居住格局、独特的清真寺建筑式样等“回族式”伊斯兰文化特点而与周围穆斯林民族形成一定差异。由于参照文化体系不同,东干人在选择“认同符号”上与中国回族不同。如在服饰上,回族戴小白帽在中国是与汉族相区别的标志之一,但在中亚穆斯林民族中,这种小帽随处可见,其不同只是款式、颜色上的区别,不能做为东干人文化认同的特有符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旗袍作为本民族的民族服饰。旗袍在中国是满族的传统服装,当东干人于清末西迁中亚时在中原大地上广为流行;而在中亚则是东干人特有的,成为东干人的文化特色之一。

民族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既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有一旦形成,便具备稳定性、传承性的特点,同时也有着不断进行充实、调整、丰富,相对变化的特点。东干文化说到底是具有中亚地域特色的回族文化,或者说是回族文化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延伸和发展。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当回族先民从遥远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来到中国时,为了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而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如明代的强制政策)舍去了“胡服”、“胡语”、“胡姓”这些文化表层特征,只在文化深层埋下了伊斯兰教信仰的根本;而经过几百年之后,当回族的一部分又从中国西迁到中亚广袤土地上的时候,恰恰又经历了“胡服”、“胡语”、“胡姓”的回归。历史实践表明,正是由于东干人所负载的回族文化是域外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它的开放性特征更突出,更容易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所以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东干人自始至终在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滋补”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东干人的文化适应,是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这种适应,改变了东干传统文化的某些特性,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交融、进步。

与回族相比,东干民族的历史要短得多,但她却在这短短的历史中,几乎重演了回族历史

的整个过程。当年,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和西亚人于战乱中万里流徙,被迫东来,经过困境中的生存奋争和痛苦磨砺,在中国一些民族长期相处、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回族共同体;数百年后,她的一部分又悲剧性地向外迁徙。他们负载着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而成的回族文化,负载着回族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计方式,进入中亚广阔的土地上,给这个多民族交汇地输入了新的文化血液,并在与中亚各民族文化以及俄罗斯文化长期的相互撞击与磨合、相互影响与交流的过程中,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与此同时,他们广泛吸取和融合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现代文明。东干文化向我们证明:地域的不同,不但创造了一定的民族在特定地域里的文化,也酿造了生存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文化的不同的地域特色。也就是说,一定的民族文化的营造,既离不开民族性,也离不开地域性。因此可以说,东干文化现象,不仅以其地域特色丰富了回族文化的内涵和形式,给回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内容和新课题,也使这种研究更趋思考上的多角度和方法上的多样化。

(二) 东干人在中亚播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其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对于历史考证及学术研究别具价值

从跨文化比较角度研究东干学,其价值还不仅仅局限于回族研究,东干人作为中华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者和保留者,研究东干文化对汉族文化的研究也有着不可多得的学术意义。中亚地区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穿越了文化的壁垒,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指出:“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自古以来就及于此地的事实”。但东干人不是中亚地区的过客,而是作为回族文化的载体定居下来,实践着中华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异域扎根、开花、结果,从而增进了中亚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中亚广袤土地上的影响力,为加强中华民族与中亚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关系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他们特有的作用。特别是东干人为了加强族群认同所表现出的强化汉文化色彩的做法,对于保留一百年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他们保留的中国西北地区的民俗比现今该地区表现出更多的原有风貌,无论从民族学、民俗学还是从社会文化学的各个角度看,都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保存和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供人们分析、比较、研究、考证的“活化石”。

再从语言上来看,可以说,要了解清代汉语西北方言,考证它在域外发展的轨迹,进而丰富汉语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宝库,那么最好能够到东干人那里去做语言调查。当然,研究东干语言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东干文的产生,开创了以拼音字母拼写汉语(先用阿拉伯字母,后用拉丁字母,20世纪50年代又改用斯拉夫字母)并被实际使用的先河,这是多少人曾经设想过的问题,东干人不但将其付诸实践,而且在不断探索和使用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无疑,这种经验对于汉语研究有着难得的意义。

(三) 中国的“向西开放”与东干人的作用

社会发展到今天,东干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非但没有减弱而且日益增强。但长期以来,由于中俄、中苏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复杂,阻碍了东干人与中国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中亚地区与中国联系的加强,东干人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

参见杨峰:《东干文化与东干作家文学漫议》,全国第八次回族史讨论会论文(打印稿),1995年。
转自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在东干学研究中,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东干族作为一个域外民族,已在中亚地区生活了120年。但这个民族毕竟源出中国,是回族的一个分支,东干人对中国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为历史故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的良好愿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向西开放”将作为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思路而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施,从而推动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西北地区成为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非洲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重要通道,再现昔日“丝绸之路”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雄风。“尽管西北地区向西开放的近期目标是周边国家和东欧市场,但首先选择的经贸合作伙伴,或者说向西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应该是中亚原苏联各国市场”。开发中亚国家市场,就不能不考虑东干人这个特殊群体,这不仅仅是因为擅长经商的东干人始终是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活跃因素,而且他们在语言及思想感情上具备增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文化交往的有利条件。我们应该重视这部分力量,以发挥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中的特殊作用。目前在东干人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语言走向”问题,即在中亚国家脱离原苏联而独立的形势下,东干族学校是继续以俄语、东干语为主的教学形式,还是加强汉语学习以便同中国“接轨”。诚然,从中亚地区的语言实际来看,以汉语、汉文代替俄语或突厥语的交际职能在短期内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可以在以俄语教学的前提下,根据东干人懂汉语的特点,以“汉文”代替学校的东干文教学。不可否认,东干文在一定时期对于东干人民族语言的保留及其提高东干人文化教育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它使用范围太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代民族交往与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然而东干人学习汉文确实存在很多困难,首先就是师资问题。前些年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中亚地区学习汉语的人很少。东干人多能讲汉语西北方言,但却难以找到一个能写汉字的人。东干人有在中亚、东欧多年从事商业、贸易的经验,他们了解当地的市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能熟练地使用俄语、突厥语、东干语,特别是他们怀有对中国的一份热诚。如果他们能够重新掌握汉语文,一定会在新世纪的现代化“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Abstract Donggan peopl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migrators of Hui ethnic group; whose population is more than 100,000, mainly distributing in Kirgiz, Uzbek and Kazakstan and speak a northwest dialect of Chinese, Their looks and custom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eoples around them. They are active in business and good at commerce. Scholars hav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m for a long time and a branch of learning on their culture Dongganology has been formed. In the paper, the Dongganological value is discussed,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the Hui ethnic group's culture in foreign lands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a.

(丁宏,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丁克定]